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民富”与“民乐”和谐共进的生动实践

——贵州“村字号”展现民生幸福新图景

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调研组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话，强调做好经济工作要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深刻揭示了国家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民生幸福的本质追求。近年来，以“村超”“村BA”“村T”“村马”等为代表的贵州“村字号”品牌集群蓬勃兴起。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贵州参与“村字号”活动约4000万人次，形成了根植乡村、覆盖全省、各具特色、梯次发展的品牌矩阵。贵州“村字号”成功“破圈”，蕴含“民富”“民乐”的深刻内涵。看实践成效的同时，更要厘清其背后深刻的政治逻辑、理论逻辑、发展逻辑与辩证逻辑，从中获得启示。

“民富”与“民乐”何以相融共生

贵州“村字号”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是多重逻辑在基层沃土生长出的团结之花、和谐之花、富裕之花、文明之花、幸福之花。

深刻体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将百姓冷暖放在心头，以实干筑牢民富根基。“村字号”坚持政府“在场不出场、补位不越位”的姿态，彰显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效、不断加强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政治逻辑。

深刻体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理论逻辑。“民富”与“民乐”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民生领域的集中体现。“民富”夯实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民乐”彰显精神富足的内在要求，二者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崇高价值追求。“村字号”的成功关键在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让群众站C位、当主角，正是这一理论逻辑的生动实践。

深刻体现从“富学乐美”到“村字号”传承升华的发展逻辑。“村字号”延续了富、学、乐、美“四在农家”的探索又有新的拓展升华：前者重在夯实基础、改善民生，后者重在激活主体、赋能发展；前者回答了“有没有”的问题，后者回答了“好不好”的时代之问。

深刻体现“民富”与“民乐”互促共进的辩证逻辑。“民富”为“民乐”筑牢物质根基，“民乐”为“民富”凝聚精神动能。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村字号”让群众在参与中获得快乐，在快乐中创造财富，形成了良性循环。

“民富”与“民乐”如何同频共振

贵州“村字号”以人的现代化为主线，

在推动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同时，促进群众坚定文化自信、丰盈精神世界，实现精神面貌与社会风气的全面提升，也践行着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理念。

群众主导：乡亲们C位、当主角。“村字号”最鲜明的特征，是将“民乐”作为激发“民富”活力的源头活水，破解了“干部干、群众看”的难题。零门槛参与，让每个人都是主角。球员是种地农民、卖菜商贩……表演是村里芦笙队、侗歌队……解说员是“草根名嘴”，都是老百姓自发的。这种“零门槛、纯业余、乡土味”的模式，让文体活动回归人民、回归生活。利益联结共建共享，让快乐转化为财富。台盘村“村BA”带动集体收入从2022年的43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500余万元；2025年榕江县“村超”拉动旅游综合收入118亿元。活动收益均来自游客在地消费，村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合伙人”，实现了“村寨即景区、村民即股东”的共建共享格局。激活能人带动效应，让快乐创造更大价值。以乡土文化能人扶持为“火种”，点亮乡村、点燃快乐。开展“名师传艺”，老年人俯身示范，把快要失传的绝活“种”回年轻人心里。能人纷纷“回流”成为“村字号”活动的中坚力量。

文化铸魂：古风焕新韵，润心田。“村字号”将非遗与现代赛事、时尚、音乐有机融合，让群众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获得快乐，让快乐成为产业发展的原始动力。深厚的文化基因，为“民乐”提供源头活水。贵州拥有757个中国传统村落、312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多民族长期共生、文化形态丰富多彩，因此被誉为“文化千岛”。民间自古便有赛马、斗牛、唱歌等丰富习俗，为“村字号”提供了天然的文化土壤。非遗的现代表达，让“民乐”焕发时代光彩。“村超”赛场上，侗族大歌、苗族飞歌、芦笙舞轮番上演；“村T”将苗绣、蜡染与现代时装设计融合。短视频和直播加速了传播，让传统文化从尘封“遗产”变为鲜活“资产”。文化自信的回归，让“民乐”转化为民富。“村字号”让群众成为文化的创造者、表演者、评判者。“村BA”万人“蹦迪”，跳出活力；“村T”舞台村民展示自制服饰，是最真实的文化自信。

产业富民：流量变增量、鼓腰包。可持续的“民乐”，须有“民富”作为坚实保障。以赛促产的产业链，让快乐创造财富，“村字号”构建了“活动引流—在地消费—特

色产业—品牌溢价”的完整闭环。“村超”推动榕江西瓜等农产品变身“网红爆款”。凯里“村T”让苗绣、银饰与现代时尚结合，民族手工技艺借由现代表达得以振兴。2025年数据显示，三都“村马”带动全县旅游综合收入达61亿元，同比增长21%；黎平“村歌”赛事带动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同比增长47%；“村超”成为榕江县城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2025年“房土两税”较2022年分别增长6478%、5542%，县外购房者占比达40%。各具特色的“村字号”共同奏响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响曲”。普惠式的增收模式，让“民富”保障“民乐”。台江通过规范摊位管理实现村集体收入跨越式增长；凯里村民通过参与服饰展示、非遗体验分享流量红利，普惠式增收让村民从“打工者”变成“创业者”，日子越过越红火。

治理创新：共治成合唱、更有效。贵州“村字号”持续火爆的关键，在于探索出“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路径。“三不”原则的始终坚守，保护民乐的纯粹性。“村字号”恪守不请明星、不搞资本介入、不设门票，赛事组织、裁判、表演均由村民自发完成，保持纯粹性与人民性。这种组织模式降低了运营成本，培养了基层群众的公共精神和自治能力。“在场不出场”的治理智慧，为“民富”“民乐”保驾护航。政府始终在场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但不代替群众做主角。黔东南州榕江县政府在“村超”爆红后，持续做好改善基础设施、加强安保等服务工作，始终把舞台留给群众。这种“不缺位、不越位、善补位”的治理智慧，是对群众首创精神的充分尊重。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让“民富”“民乐”协同共进。群众成为发展的主角，文化成为连接的纽带，基层治理的向心力、凝聚力自然增强。榕江县在游客激增情况下，刑事治安警情总量不升反降，2025年群众安全感测评获满分，排名全省第一。

精神共富：口袋脑袋一起富、向未来。贵州“村字号”实现了“民富”与“民乐”的辩证统一。情绪价值的转化变现，让“民乐”成为“民富”的源泉。“村字号”回应了当代社会对“情绪价值”和“烟火气”的深层需求。“村超”赛场上发自内心的呐喊；“村T”现场最

本真的笑容；“村歌”带来的心灵震撼。这种“无添加”的快乐体验，成为吸引游客“千里奔赴”的根本原因。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让“民富”“民乐”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升华。在“村字号”活动中，各族群众不分你我，“同吃一锅饭、同唱一首歌”的朴素场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写照。

以民为本富乐共进的新启示

推进“民富”与“民乐”和谐共进，是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基本要求。贵州“村字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鲜活范例，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宝贵启示。深耕“两个结合”，让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实效。“村字号”赓续“民为邦本”的中华传统民本智慧，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重要成果。“两个结合”让“村字号”焕发生机活力，让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民生实效，实现“民富”经济增收与“民乐”精神愉悦同频共振。用好富乐“标尺”，让民生福祉更有成色质感。“民富”“民乐”是传统民本思想的时代升华，也是检验乡村全面振兴成效的标尺。贵州“村字号”实践证明，唯有把握“民富”与“民乐”辩证法则，让社会民生更有温度，人文更有厚度，方能同心筑梦，行稳致远。锚定发力支点，让文化自信更有底蕴底气。推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的同时，深挖乡土文化，深化文旅融合，让非遗创造性转化为产业增值的“民富”实效，不断推动文化惠民、文化乐民、文化富民。践行共治理念，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力度。依托“村字号”蓬勃发展，贵州探索出政府引导、群众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降低治理成本、提升自治能力，群众满意度随之上升，让“民富”“民乐”成为乡村全面振兴最温暖的底色。

从新农村探索实践到“村字号”蓬勃发展，贵州在基层创新创造的道路上一脉相承、继往开来，构成了新时代乡村逐步“富起来”“美起来”“活起来”的内在逻辑。“村字号”所涌现的活力与热闹，正是贵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的生动诠释。

（执笔人：徐颖、宋小红、王贵森、萧子静、蒙锦贤、唐文昊、刘坤厚）



黔东南州三都自治县“村马”赛马场马术表演。 杨文舒 摄（影像贵州）

用好民族文化资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殷俊 魏文静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要保护有形的村落、民居、特色建筑风貌，传承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在利用中更加鲜活，不断焕发新的光彩。这一重要指示为贵州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指明了前进方向。要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通起来，把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久力量。

以宣传阐释深化文化认同。贵州18个世居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融通的形态，沉淀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价值追求和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要从一座村寨、一件器物、一项非遗、一段历史中，讲清楚各民族共同建设贵州、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讲清楚不同文化形态背后的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让各族群众从可知可感的文化遗存和现实生活中认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

以传承创新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把文化遗产保护、价值阐释和创新转化贯通起来，在保护中传承文脉，在阐释中彰显共同价值，在创新中增强文化吸引力。要进一步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考古成果、革命遗址、民族古籍、传统村落和非遗贯通起来，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团结精神和奋斗品格，使之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的公共文化内容。博物馆、文化馆、纪念馆、学校和旅游景区等公共文化阵地，要通过史实、文物和人物讲好贵州何以多彩、各民族何以相亲、中华民族何以一体的故事。主流媒体、高校和文博机构也要加强协同，在展示文化特色的同时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现实，让各族群众在共享文化成果中守护共同的根、传承共同的魂。

以交往交流交融增进共同情感。要不断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条件，在经常性互动中增进理解、积累信任、深化感情。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通过社区议事、邻里互助、志愿服务和群众性文体活动，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中守望相助。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好促进沟通交流。注重把节庆文化、公共文化活动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起来，让不同民族群众从“住在一起”进一步走向“融在一起”，在共同生活中积淀共同情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深入人心。

以文化赋能促进共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需要深厚的精神文化基础，也需要共同发展的现实支撑。贵州文化资源、生态资源丰富，发展民族特色手工业、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和文旅体融合产业，有利于把文旅资源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如黔东南州榕江县以“村超”为平台推动农文旅旅融合发展，并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全国首批“共同现代化试点”之一，各族群众通过参与球队、拉拉队、民宿经营、农产品销售等多种方式共享发展成果。这一实践把群众参与赛事、展示文化与发展产业有机结合起来，把文化活动转化为拓展交往空间、连接文化资源 and 促进群众增收的综合平台，文化赋能发展的价值，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奋斗、共同受益的过程中体现。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推动多彩贵州的文化之美更好转化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神力量。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重庆工商大学传媒发展中心助理研究员）

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

郭于晋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这一科学思想体系源自深厚的理论根基、丰厚的文化传承、深刻的政镜鉴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根本宗旨和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探索管党治党的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在继承这些深厚且坚实的理论宝库基础上，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创造性提出了以“十四个坚持”为集中概括的，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丰富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彰显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源自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习近平党建思想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汲取丰厚养分，并将这些优秀元素转化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传承“民为邦本”的人民情怀，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传承“革故鼎新”的进取精神，转化为“自我革命”的政治气魄；将“礼法合治”的治理智慧，转化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治党智慧；将“任人唯贤”的用人方针，转化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哲学；将“正心明道”的修身哲学，转化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政治自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安邦理

政、治国之道、修身处世、道德理念等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彰显了深厚的文化自信，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

源自对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总结和镜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历史上，一些曾经独领风骚、长期执政、叱咤风云的大党老党最终葬送了自己的前途、丧失执政地位，都留下了沉痛教训，为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深刻镜鉴。习近平党建思想借鉴世界政党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深刻思考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的政治自觉不够、思想教条僵化、理想信念动摇等政党治理难题，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之治的新气象，不仅为深入推进新

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和实践遵循，也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源自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现实需求和不断探索。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紧扣党在新时代面临的历史使命和风险挑战，既从理论层面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又在实践层面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历经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检验，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必将持续指引我们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

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民族地区基层治理

尹训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事关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大局。将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基层治理，需要在主体协同、自治活力、制度供给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持续释放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能。

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核心在于将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基层治理架构。推动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从“行政管理型”向“服务型引领型”转变，落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治理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将党组织嵌入网格、党员下沉网格，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全面落地。构建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基层治理不能仅依赖政

府，要积极培育和引进社会组织、企业、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多元力量。发挥苗族“议榔”、侗族“款约”等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建构传统调解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衔接机制，推动形成“政府—社会—群众”良性治理生态。完善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广黔东南州榕江县“党建引领、多元联调、情理法融合”的解纷模式，综合运用自主调解、民调调解、多所联调等方式，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总结推广“枫桥式人民法庭”的联动调解经验。推动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强化其在矛盾排查中的源头发现功能、分流交办中的枢纽调度功能、跟踪督办中的闭环管控功能，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激发基层自治组织内生动力，破除效能瓶颈。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命力在于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厘清职责边界，为基层自治组织减负赋能。推动“行政”与“自治”适度分离，借鉴遵义

市湄潭县“清牌行动”经验，明确村级组织履责事项、协助办理事项和不能办理事项，推动基层职责“清单化”管理。完善村干部素质提升激励机制，将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薪酬待遇挂钩，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借助数字技术助力基层治理。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模式，优化网格化管理体系，推动网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职责清单化、考核制度化，以精细服务贯穿治理全过程。推进线上线下服务深度融合，打造“集中式+自助式”互补的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培训力度，增强基层干部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治理能力。

完善软硬协同的制度供给体系。完善制度供给，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民族地区基层治理路径突破的关键。加强民族地区正式法律规范的精准供给。结合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实

际，制定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单行条例。避免“大而全”的宽泛立法，注重“小而精”的精准立法。推动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拓展群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大力推进村规民约的规范化建设。村规民约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软法”，具有独特的规范功能，应完善制定流程，强化民主协商基础，结合民族地区实际，合理设置行为规范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推动村规民约的落实和监督。推动非正式规范与国家法治的有机衔接。在推进法治建设过程中，注重民族地区文化习俗、村规民约等非正式规范与国家法律的协调配合，形成既有制度保障又有文化温度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推动法治、德治、自治有机结合，让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地生根，不断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本文系省社科规划课题〔24GZQN24〕阶段性成果）